阅读周刊 READING WEEKLY

随意翻读

《作家文摘》评出十大影响力图书

本报讯（记者**张黎姣**）日前，由《作家文摘》主办的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评选活动在京举行。该活动的评选范围限定于非虚构类作品，重点关注文史、纪实类作品。活动现场由专家、学者、出版人等，从40本入围书目中投票选出获奖作品。最终，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陈独秀全传》、《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》、《落泪是金·十五周年纪念版》、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等10部作品上榜。

《忽略秘密，记住音乐》解密“音乐圈那些事儿”

本报讯（记者**吴晓东**）日前，解密“音乐圈的那些事儿”的《忽略秘密，记住音乐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。该书由资深乐评人王磊撰写。对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12年的音乐专辑进行全面点评。其时间跨度30年，全书13万字，收录了近百篇乐评，堪称一本中国流行音乐指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忽略秘密，记住音乐》是第一本可以“边读边听”的乐评集，因为每一篇乐评下方都有被评论专辑的试听二维码，读者可扫描后去听这张唱片，重新品味曲中的奥妙。

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评奖榜单出炉

本报讯（记者**桂杰**）近日，由《法治周末》主办的十大法治图书评比落下帷幕。十大法治图书榜单中排名第一的为《出没风波里：江平和他的时代》，是陈夏红编写的江平传记。其他8本图书分别是：《我们律师》、《民主的奇迹：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》、《谁来守护公正：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》、《坐待天明》、《我们人民：奠基》、《斑马线上的中国：法治十年观察》、《刑法格言的展开》（第三版）、《法律后面的故事》、《善与恶：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》。榜单中，国内图书6本，国外图书4本。

获奖图书《坐待明天》的作者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教授表示，在这个时代，有良心的学者要不断发声，说出自己的思想，来给民众以启示。获奖图书《斑马线上的中国》的作者邓子滨研究员讲述了该书背后的故事。他以一件发生在北京沙滩路口一位女士阻止路人乱穿马路的小事，思考了如何解决斑马线上的矛盾和冲突。他说，如何解决斑马线的问题，不仅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，还考验公民的自制能力。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轩称赞《斑马线上的中国》一书中每篇文章的标题都堪称一条法律格言，惜字如金却一针见血。

《中国画学刊》创刊

本报讯（实习生**张云鹭**）日前，《中国画学刊》创刊号首发式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行。

《中国画学刊》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、中国画学会和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共同创办。

据介绍，国内现有的美术期刊，或为综合性，或偏于艺术理论，呈现中国画内容的美术期刊相对较少。这些状况一方面显示出当前美术刊物的低迷，另一方面表现出美术刊物特别是中国画刊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需要有权威学术机构的引领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运行。

据悉，《中国画学刊》设有热议、专题、名家、画语、画论、画史、品读、雅韵、资讯、专访等栏目，将系统地推介和宣扬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画取得的成就。同时，针对中国画发展的流弊、倾向、问题，将刊发谈论热议。对于相关的中国画展览及文化交流活动等资讯，将予以关注。

《最美：唯有时间了解爱》讲述爱情

本报讯（记者**桂杰**）近日，《最美：唯有时间了解爱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。本书作者包括刘震云、桐华、麦家、宁财神、严歌苓、冯唐、陈丹燕、蒋方舟、苗炜、张悦然、石康等知名作家，以爱情短篇小说的形式探讨了都市情感话题。该书还有梁家辉、黄渤、徐铮等35位演员加盟，由知名摄影师为其拍摄情节配图。让读者在书香中感受爱情，于纸上观赏平面电影。

《最美：唯有时间了解爱》名为“最美”，旨在取“最美的文字、最美的人、最美的爱情”之意。“唯有时间了解爱”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。因为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唯有时间，能让粉饰全部脱落，显出爱的本来面貌。最终沉淀下来的，并不是爱本身，而是那些或欢快、或悲伤、或轻松、或遗憾的心绪。

该书包含15个故事。其所收录的短篇小说中，长则三五千字，短则三言两语直触人心。它们描写了15种不同的情感人生。

《口碑》：一个好干部留下的震撼与思索

时代变了，生活变了，但人们心中为官为人的准则没变

纸上中国

吴贤雕

党的好干部罗贻斌一生拒收任何礼物，但这一份礼物——《口碑》一书是湖南省安乡县为纪念罗贻斌县长30周年而组织编纂的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。该书除了收录回忆罗贻斌的文章之外，还有反映罗贻斌精神的诗、书、画、联。撰稿者有省领导，罗贻斌生前部下、同事、发小，还有普通百姓。该书字里行间融入了浓浓的真情实感。那是一帧帧写实的素描，呈现了党的好干部罗贻斌自参加革命之日起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不谋私利，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。

罗贻斌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，主体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。那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、工作方式与现在有很多不同。罗贻斌是赤脚下田搞播种示范的。那时候的水利工程动则几千上万人参与，罗贻斌骑着破单车、穿着黄胶鞋，在建设现场指挥。他开全县大会时没有人给他写长篇报告，是他自己把调研来的情况说得生动形象，让全场鸦雀无声，博得掌声雷动。他不会捞好处，父母、爱人都当农民，一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。他当县长的就职演说承诺了两件事，一是让农民食油自给有余，二是农村瓦屋化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，现在，安乡县农民有油吃，住瓦屋早已不是问题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，早已超出了罗贻斌的想象。可人们却强烈地怀念那个远去的背影。

罗贻斌不是名人，更不是伟人，他只是一个芝麻官；他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惊人壮举，有的只是在艰苦农村奔走几十年的平凡足迹。然而他却让人们感到那么的不平凡。翻开书本，开篇几行就让人看到一个震撼的场面：清明节，数不清的相互并不认识的人们在罗贻斌墓前祭扫，而且三十个清明节年年如此。罗贻斌逝世时，有长者跪地拦柩。这里没有利益驱动，没有官方组织，人们纯粹的发自内心敬仰与爱戴。

俗话说，人走茶凉。罗贻斌走了30年了，这杯茶不仅未凉，而且变得更加滚烫，这是为什么？时代变了，生活变了，但人们心中为官为人的准则没变。人们希望生活富裕的同时，干部的工作作风还能像罗贻斌一样踏实；人们希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官员仍能像罗贻斌一样的廉洁；人们希望在关系日益多元的同时，人与人相处仍能像罗贻斌一样坦荡。这，就是罗贻斌魅力能穿透30年岁月不减反增的原因所在！

在《口碑》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廉洁自律的县长。那是一栋比普通农家还要破烂的茅草房，连两扇房门也是芦苇编成的。这就是县长罗贻斌的家。大队干部看不过去，要为他改善住房条件，他坚决地拒绝了。他说，等社员们都住上好房子了再解决自己的住房。他的爱人、公婆就几十年住在这间茅房里。他的两个女儿结婚，他把婚期保密，没收一分礼金。这与当前某些利用婚丧嫁娶大办宴席、大肆敛财的贪官们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下乡检查工作，生活上不许半点特殊。一次他去安文乡，午饭过了，乡政府领导从小饭馆炒了两盘菜来，他坚决退了回去。

在《口碑》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心里只有全县人民、完全没有自己的县长。这是一个与洪魔对阵惊心动魄的场面——豆港堤段洪峰已漫堤面，全靠1.7米高的子堤挡洪。狂风暴雨中，罗贻斌把指挥船停在最危险处，有人建议船停在安全一点的地方，可他坚决不准。他说，这就叫破釜沉舟，没有退路。这无声的行动传达了他与大堤共存亡的决心，群众抗洪的热情更加高涨。洪魔败退，病魔却在折磨他的躯体。安乡人总把罗贻斌比作焦裕禄，说罗贻斌是官员的榜样。焦裕禄的榜样称号是毛主席给的，彪炳史册。罗贻斌的榜样称号只是老百姓口授的，虽不能入正史，但别有一种价值。

在《口碑》中，可以看到一个亲民的县长。只要罗贻斌发现谁有难处，他都会伸出援手。农民王友强患骨髓炎，命在旦夕，罗贻斌与妻子筹款送到医院；下乡青年毕家厚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能回城，写信求助罗县长，罗贻斌给帮助解决；地处洞庭湖区的安乡人多种水田，缺少食油，他亲自试验稻油三熟制，不仅结束了安乡人缺油吃的历史，而且油菜还成了安乡农民的一季收成；为了让千百年住茅棚的父老乡亲从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的惨景中解脱出来，他顶着“放任资本主义歪风蔓延”的帽子，鼓励农民在秋冬或早晚做砖做瓦改建住房。

在《口碑》中，还看见一个热爱生活、关爱亲人的县长。逢年过节，只要不出差，他就在茅房里陪老父亲小酌几杯。父亲病了，他亲自熬药，扶老父亲上厕所；在北京出差，他寻觅着买到女儿爱吃的大白兔奶糖；妻子种地，日晒雨淋，他对妻子恩爱有加，陪她到医院检查身体。

去年，《口碑》的首发式，同时也是纪念罗贻斌逝世30周年纪念会，由民间出资，近200人参与。其场面壮观，十分感人。应该说，这个纪念会以时下功利的眼光来看，对罗本人或他家人来说计算不出半点实际价值。然而，用当前社会急需的另一种价值来“称重”时，又能衡量出多么沉重的分量啊！

读着《口碑》，人们总说，书中这一切好像离现实遥远。罗贻斌这样的人，现在好像没有了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现状，罗贻斌的精神风貌才越发被凸显了出来，他的精神价值才越发值得珍重。《口碑》确实是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。因为，它所呈现出的精神价值富可敌城。它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一份精神厚礼。

余秋雨：谣言让我成为“雾霭人物”

本报记者 桂 杰

有关余秋雨的新闻一直不断。继去年10月在联合国总部畅谈“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脉”之后，日前，他的最新著作《吾家小史》(精装版)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书中，余秋雨对各种谣言作出回应。余秋雨说：“因为有那么多虚假，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。但在平时，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，黯淡了，褪色了。等到谣言一起，真实的记忆从深处被唤醒。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，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。”

去年6月，余秋雨将之前出版的《借我一生》、《我等不到了》改写为这本《吾家小史》。《吾家小史》讲述了余秋雨和其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从前辈到自己——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，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，被诟病已久的“文革”经历，“诈捐门”始末，与马兰的“被离婚”，第一次婚姻及收养的女儿，都在本书中做了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。出版方认为，该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，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。

与其他“余氏作品”不同的是，在该书中，余秋雨花费了大量笔墨记述了岳父、岳母的非凡经历，以及妻子马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选择。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妻子的浓浓爱意。

谈到该书的动意，余秋雨表示，这是他的某种“回应”。近年来，社会上对余秋雨本人有诸多批评和质疑。他表示自己“受害匪浅”，十分痛恨谣言。他在该书自序中说：“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，也有很多毛病。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，是它纵容谣言。”他在书中也将自己被种种传闻中伤的经历陈述出来。

余秋雨说：“我自己，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，所感动……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，对谣言表示感谢。”

该书专有一章记述余秋雨在母亲病榻前的内心独白《侍母日记》。其情深意长、直抵心灵的文字，让读者看到另一个余秋雨。他曾多次表示，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，他对母亲的感情也十分深厚。2012年12月，母亲病危，他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，推掉所有的工作，在医院陪伴病危弥留的母亲。在这期间，写下《侍母日记》。

他写道：“直到今天，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，我才细看妈妈的嘴。它的张合，是我们的童年；它的紧闭，咬过了饥饿和灾难；它的微笑，是我们的家园。此刻，它终于干涸了，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……”

“妈妈，您知道吗，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，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……”

他还写道：“我爸爸，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。他的死，有医学上的病因，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前床头的三份报刊。一份广州的，一份天津的，一份上海的，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。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，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‘文革’中的悲惨经历。一种巨大的逆反，让老人家痛彻心扉。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，终于牺牲，为了他的儿子。”

余秋雨表示，由于某人连续不断地将谣言堆砌，使他成了一个疑点很多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“雾霭人物”。“从另一方面看，‘雾霭’成了一个隔离层，使我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、走那么多路、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。”

在本书最后，余秋雨说：“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。这历史，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，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。而正是这区别，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，与文学本性有关。”

独立书评

人的立场与史的思索

——评顾伯冲《倾覆与重构》

郁 文

近日，学者顾伯冲怀抱着对过往历史经验的尊重与思考，以一部新著《倾覆与重构·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》，正面诠释农民话题。

正面这个话题，首先要用一个公允的视角，对历史上风云变化的农民起义做新的审视。顾伯冲选取的视角是“人”的立场。该书是基于“人”的立场而展开的思考。

作者在书的开篇这样说：“拙著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剖析中国古代那一场场农民起义，从人性的视角去窥视、挖掘农民起义背景下的人的命运、情感、行为，进而从政治文明、经济发展、天时地理、文化基因、民族秉性等方面去一层层揭开那些曾经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。”发起和参与农民起义的成员，他们都是“人”，全都怀抱着“人”最基本的需求、最隐秘的欲望以及最根深蒂固的弱点。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，往往是左右着农民起义兴与衰的内在力量。因此，要全面透视并正确评价古代农民起义，必须站定“人”这个最朴素也最本真的立场。

在该书中，作者牢牢把握住了“人”的立场，以历史记载为基础，融合了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宗教学、军事学等多元视角，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，对农民起义的原因、类型、组织、运转、特点、结局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细致的分析与阐释。这样的格局，不但有助于发现和归纳农民起义的特色，而且有助于消除历史经验与现代思考的隔阂，以一个宏大的现代视角，将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农民起义浓缩为一部厚重的作品。

在清理史实与展开剖析的同时，作者时刻不忘对人性的关注。该书在注重挖掘人性深处的情感与欲望中，时常闪烁着对人性的体悟及思考。第十章就是一个典型。其中对农民起义败因的分析，作者非常敏锐抓住了农民队伍的几个短板：对“龙椅”难以遏制的贪欲，对美色与财富的垂涎，还有“窝里斗”这种“拿手好戏”等。正是出于人性深处无法遏制的欲望、难以掩饰的贪婪，最终留下的也只能是失败的无奈。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亮点，如，第三章中探讨的农民军的“神”性与“魔”性，农民起义的“有理”与“有罪”，可贵的“副产品”与可恶的“后遗症”等。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思索，无不围绕人性而来，实际上是在“人”的立场上实现了对农民起义的深刻解读。

以“人”为中心，作者的叙述和思考都由此展开，在作者笔下，那些在历史典籍里沉睡多年的农民起义似乎有了鲜活的颜色。叙事朗畅而又富于理趣，成为该著在文笔上的显著特点。如，第九章特别具有代表性。这一章分析起义军领袖以及起义军成员的情况。作者把起义军领袖比喻为“班长”，把起义队伍比喻成班长所带的“班”，先对班长的出身、职业、年龄、文化程度做了详细的考察，又对各个“班”的组成情况做了贴切而风趣的说明。如，陈胜、吴广的班子“是临时拼凑起来的，总体上是一盘散沙”；刘邦的班子“基本上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团队”；项羽的班子“是个大杂烩式的既得利益集团”；李自成的班子“是主要来自乡党却各存异心的‘马帮’”；洪秀全的班子“是一个由低级迷信组成的‘梦之队’”……这些说法，风趣又精辟，形象又贴切，很好地揭示了各个农民起义队伍在领导和构成上的特点。作者以贴近现实的笔触来呈现各类起义人员的面貌和起义队伍斗争，从而描画出一幅生动鲜活的众生相。

此外，该书集中梳理各种阶层对农民起义的态度：政治精英的“首鼠两端”、文化精英的“内心矛盾”、经济精英的“进退两难”、草根阶层的“先热后冷”，将不同身份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一揭示出来，鲜明而生动，既有“理”，也有“趣”。

基于“人”的立场，作者在对农民起义作系统的分析与思考时，特别能够发现人性深处那些历经岁月仍然未曾改变的特质，并从中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之处。该书找准了封建专制的畸形文化基因：统治阶层对民众思想的钳制、少数人对国家大权的垄断、政治的腐败与贪官的增长、对农民利益的蹂躏与恣意掠夺……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在揭露了封建专制的罪恶的同时，也可以引发人们的思索。

在书中的许多叙述里，其实都隐含着作者对现实的观照。而这种观照，其实是作者撰写此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。恰如作者所言：“历史的脐带喂养了昨天，也连襟着今天。”在作者看来，对历史的反思，其实为的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。在对农民问题的历史回顾中，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作者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努力，体会到作者内心对民族与社会的深刻关怀。这种超越性的精神诉求，正是这部著作的闪光点。

书里书外

在这里，望天边

——序《呼伦贝尔之殇》

李敬泽

1

这些文章里有天和地。天是长生天，地是大草原。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，站在茫茫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方知天是这么近，天注视你，天倾听你的诉说；你躺在地上，天就是蒙古包的帐顶，大地供你安眠。

在天和地之间，有一人、一马。

这时，人是小的，小到如草芥如微尘。因为比量、对照着人的是天和地。

但这时，人也是大的，大如巨人，如神，因为这个人在天地之间行走，他或她，是顶天立地的一个人。

2

有天地的文章不多。天地之间的一个人，能见出、写出他的至大与至小，这样的文章更不多。

艾平的《呼伦贝尔之殇》就是如此文章。

3

至大与至小，那些人、那些生灵，他们的生命中都有奔腾热血、凛冽长风，皆如冰冷的刀和怒放的花。

但是，当他们卑屈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，在天地间俯伏下去时，他们亦是令人肃然——在严酷的命运和时间的碾压下，他们那种隐忍、那种顺受、那种安详。

这就是走在天地之间的真义：天高地阔，人欢喜着，放浪形骸，于人间万物皆有真情；但天地无情，人也本知道天地无情，如年老的狼寻僻静处自去了断，他们不纠缠，不抱怨，没有丝毫自怜。

他们的强和他们的弱，都是高贵的。

4

他们身上有神性的光——

那些猛兽般的猎手和骑手；那个把一个又一个孩子留在草原上的小额吉，她的母性广大慈悲近乎于神；那个制造雕花马鞍的人，他是神的工匠；那个血腥的肉联厂的主人，他如同自然意志坦荡而威严的执行者……

在此时，在2014年，他们是如此陌生。在这个市民的时代，在高楼的森林中，每个人都在蜗居中蜗角上在一毫一厘间掂量着家常日用的真理，我们久已不见星空、久已不践泥土，我们靠天气预报过着日子，久不知天地消息。

他们离我们那么那么远。远得如史诗、神话一般。

5

因为在小说中，我们会计较他们，会用我们的人性水平和生命尺度去想象他们，会不由自主地驯服他们，会轻率地、自以为是地判断他们，会迫使他们失去他们本有的单纯——一种未经损伤的人性。

他们，这些人，只宜于歌唱和咏叹——用我们身体内部的声音，不，还不能是我们的，我们的“好声音”都太急、太尖、太华丽、太自怜自恋，已经失去了来自身体来自心灵的本能力量，只能用那种在草原上、天地间养出来的干净的声音，慢慢地、悠长地唱他们，仰望着、目送着他们。

歌声和诗意。他们走在歌里、走在诗里，走在长调里。

6

谁知道呢？也许在这个时代写诗本身就是做作的，这个时代已经不再生产那种献给神的诗，她写的是散文，最古老、最基本的话语方式，好好说话，就用这说话的文字，讲述那草原、山林、人和生灵。

就像从容珍重地杀一头羊。

就像爱惜欢喜地展开一匹闪闪发光的蓝色的缎子。

7

很多文章是无声的，文字落在纸面上，只是文字，只诉诸眼睛。

但艾平的文章是有声音的，你会在内心念出来，渐渐地，你会找到节奏、语调甚至曲调。

你似乎不是在用眼睛和大脑，用的是耳朵和心。

你骑在马上，听远方传来的长调。

8

艾平在草原上奔走，她四面八方找啊找，就像找她的前世，找她的亲人，她找到那些巨大的、神一样的人，她找到他们，就像领回失散的孩子。

然后，她让他们再活一遍。

让他们再死一次。

在文字中，把他们庄严地安葬。

9

有时，艾平与她的人物和文章的关系令人困惑，《肉联厂》里的那位父亲，大概就是艾平的父亲，《呼伦贝尔之殇》里的姥爷呢？似乎是艾平的姥爷，但是，如果和其他文章对勘，你就不能那么肯定了。《我是马鞍巴特尔》、《额麽格》，那完全是另一个人的声音：现在，“我”在这里，“我”开始吟唱——而艾平和我们屏息静听。

可以想象，这样的文章放在另一个人手里会怎么写，这个人是散文家，这个人无比珍惜他的文字，这个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，他真的认为自己的出场无比重要，世界因为自己的书写才获得意义。所以他要对得起这次出场，他要在他碰到的一切上面堆积成吨的意义——世界很累，世界被那些字压得面目全非。

但艾平不是这个人，她真的认为自己不重要，她是一个谦卑的书写者，她真的认为，天空和大地更重要，那些人和神才更重要，比自己重要得多。

她就如同一柄马头琴，似乎是，她将这把琴交到她所热爱、她所崇敬和倾慕的那些巨人手里。

或者，她是一个萨满一个巫。她是一个世间凡人，被命运选定，传达天地消息，传达来自过去的祖先的声音。

所以，她的文字是声音，轻而长的声音，具有情感力量，却拒绝深度——拒绝解释、拒绝隐喻，她的文字是她的世界的自然呈现，世界止于它自身，世界止于文字。

10

是的，她要保存记忆。

不仅是个人的记忆。她隐秘的心愿，或许是，留下一本“神谱”，为草原、为呼伦贝尔，哪怕这本神谱也会遗失也会被忘记，记录本身就如同一次仪式，一次灵魂附体，一次向着呼伦贝尔的呼唤。

11

呼伦贝尔是偏远的地方，是待开发、正开发的地方，是乘坐飞机和火车前往旅游的地方，是乘坐飞机和火车离开的地方。

是被现代化的标准从外部衡量、规划和改变的地方。高楼，汽车，公路，GDP，煤田和工厂。

是一个“去魅”的、不再有神的地方。

12

但没有神，没有那些高大的人和通灵的兽，没有祖先的气息在我们的呼吸中流动，呼伦贝尔还是呼伦贝尔吗？

13

呼伦贝尔就是“这里”，它不是被从远方界定的地方，不是被一支外面的手指指着的地方，不是“他者”。呼伦贝尔就是它自己，是世界的中心，这是高贵的黄金草原，在天和地之间无限伸展。

14

这个时代的人大多生活在别处。生活在别处被认为是美德和进步。

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处心积虑地让我们生活在别处。通过电视、手机、互联网，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活在别处，活在别人的地方和别人的生活里。而此处、此心，任它荒芜、沉默。

15

对艾平来说，写作的意义在于“寻根”。与上世纪80年代的“寻根”不同，她只是要确认自己拥有一个此处，一个可以安顿祖先、安顿自己的地方。

在这个地方，人看着天和地和自己，他知道，此地的一切确切地属于自己——来处、所在、去处，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别人的。

这里的人衡量生命有“上下”，天看着、地载着，生于天、归于地。

而我们，没有“上下”，只有平面，只有左邻右舍、只有地图上的这一点和那一点、只有朋友圈和粉丝群，我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东张西望、左顾右盼。

16

我们过得很热闹。

而艾平的呼伦贝尔是寂寞的，那些人是孤独的，那些牛、马是孤独的，他们生息在草原上山林里，像风一样过去了，像草木一样荣枯。他们确知自己将被忘记，但是，他们对此并不挂怀。

说到底，天和地终将忘记一切。

《呼伦贝尔之殇》，这是安魂与招魂之书，那些茫茫苍苍的人和生灵，他们在天边隐现，残阳如血。